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额勒和布日记（上）

额勒和布著 芦婷婷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额勒和布日记（上）

额勒和布 著

芦婷婷 整理

本辑执行主编 徐雁平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额勒和布日记 / 额勒和布著 ; 芦婷婷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8. 6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五辑)

ISBN 978-7-5506-2786-4

I. ①额… II. ①额… ②芦…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清后期 IV. ①I2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012号

- | | |
|---------|---|
| 书 名 | 额勒和布日记 |
| 著 者 | 额勒和布 著 芦婷婷 整理 |
| 责任编辑 | 韩凤冉 |
| 装帧设计 | 姜 嵩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 226300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23.625 |
| 字 数 | 613千字 |
|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786-4 |
| 定 价 | 130.00元(全二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3-80237871) |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知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
知音，千載其一乎！（一）之心
知音，今讀新編稀見史料，
利，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謹書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題辭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軍機處交出奉

中央民族

上諭麒麟慶奏審辦土默特貝勒旗老頭會一案請簡派大員會同查辦一摺著派理藩院侍郎額勒和布馳驛前往熱河會同色伯克多爾濟麒麟慶提集全案人證卷宗秉公審辦迅速奏結該侍郎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欽此又准字寄奉

上諭前因土默特貝勒旗老頭會緋金太那木薩賚等聚眾滋事及該旗塔布囊察固特古爾圖等呈控緋金太等抄搶飲錢等情降旨飭交麒麟慶會同卓索圖盟長派兵查拏懲辦茲據麒麟慶奏稱半年以來應提之人犯未齊續控之呈詞皆至

同治五年歲次丙寅九月十八日巳刻文子星稟見
會午刻進署堂齊散後赴府衙門會同竹樵過堂
散後回廂少歇申刻赴樹南之約子良海嵐蓮舫在
坐掌鐙後散同海嵐拜靜邨會談至子初始回廂晴
浮雲已刻將軍衙門送閱初八日拜發回摺

會奏添設海關
道員摺奉

古該部連議具奏欽此
官兵
過境摺奉
旨知道了欽此

十九日午刻蓮舫拜會見未刻同赴瀚嶠之約竹樵
謁雲吉甫樹南在坐戌初散回寓晴風微雲
二十日午刻赴將軍衙門會同拜發恭賀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申刻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察哈爾都統額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奉

上諭常順奏叅贊大臣騷擾臺站一摺據稱叅贊大臣文奎自出傳單為由京帶來之藥商徐姓傳坐駕杆車進口經常順派員往查應差檔案亦有由烏里雅蘇台進京公幹之候補知縣徐英傳用駕杆車輛等項之事並據戶部章京稟有文奎帶來徐姓現欲回京願將所攜藥料作價入官是徐姓

59021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

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

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裛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勸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們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言

一、《日记》作者

额勒和布，字子谦，号筱珊（一作“筱山”、“晓山”），觉尔察氏，镶蓝旗满洲人。生于道光六年（1826）。咸丰二年（1852）翻译科进士，历任理藩院右侍郎、盛京户部侍郎、察哈尔都统、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职。光绪三年（1877），因病开缺。光绪六年（1880）复出，历任热河都统、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职。光绪十年（1884），充军机大臣。复历任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二十年（1894），免军机大臣。二十二年（1896），致仕。二十六年（1900），卒。谥“文恭”。

关于额氏之性格和操守，《清史稿》卷439《额勒和布传》称其“木讷寡言，时同列渐揽权纳贿，独廉洁自律，时颇称之”。

二、《日记》内容

《日记》原稿现藏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计二函十七册。前十六册记录了额勒和布审理蒙古土默特贝勒旗老头会案件的始末，以及额氏在理藩院侍郎、盛京户部侍郎、察哈尔都统、乌里雅苏台将军任上的一些日常事务。最后一册为额氏所辑同治十二年（1873）、十三年（1874）与其任职相关的上谕、奏折。

《日记》记事起于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五日，止于光绪六年（1880）正月初十日。《日记》系逐日而记。因额氏丁母忧服孝之故，缺载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初八日至八年（1869）五月二十三日。

《日记》记事时段内，额氏之行实颇有助于了解《日记》之内容。

《清史列传》卷 57《额勒和布传》记其任理藩院右侍郎时，会卓索图盟土默特贝勒旗（土默特左旗，今辽宁阜新）老头会聚众肆掠，势甚炽，“额勒和布奉命往查，廉得实，请将贝勒议处，其佐领、章京德瓦拉布窄等降革有差，事遂定”；其任盛京户部侍郎时，奉天马贼煽动，直隶总督刘长佑领军驰抵三屯营，防剿热河之平泉州、建昌县、朝阳县、赤峰县及奉天府各地方，“额勒和布筹备军饷，无误戎机，功最多”；其任察哈尔都统时，正值新疆用兵，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设粮台于察哈尔，“额勒和布为之派员经纪，转运督催，应时接济，军用赖以不匮”；其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时，回民军大股攻扑布伦托海，并窜踞沙札盖等处，“额勒和布亟督各营侦探截剿，杀贼三百余名，余匪骇逃”。

三、《日记》流转

额勒和布卒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其在世时《日记》应不会流出府邸。《日记》从其后裔手中流出的可能性更大。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地名志》记载，额氏独子伯麒紧随其父之后，亦卒于当年，则《日记》应于此时转归伯麒之子世斌收藏。世斌卒于 1934 年，《日记》从其手中流出的时间可从其家族衰败的时间进行推测。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额勒和布住宅在北京西城阜成门内武衣库（今大乘胡同）。该宅由额氏购于同治九年（1870）（《日记》同治九年十月初十日）。五十余年后，该宅由世斌分别售予国民军将领宋哲元和自来水公司周某。周某为何许人虽无从考证，但宋哲元却有踪迹可寻。据吕伟俊《宋哲元》一书记载，1924 年宋哲元参与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并在当年迎双亲至京居住。则额氏老宅转手宋哲元的时间应在 1924 年左右。而世斌约在此前已穷困潦倒，否则不至于走到卖府的地步。《日记》或于世斌卖府之前已流于坊间书肆。

《日记》原稿第十七册封底有铅笔字迹“聚美书店，700 元”；又，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成立于 1950 年，则《日记》当在 1950 年后由该校图书馆以七百元高价从聚美书店购得。该馆工作

人员整理《日记》时曾作一夹签，其字墨笔繁体竖写，内容如下：

《额筱珊日记》，十六卷由同治三年至光绪六年，《廷寄录存》一卷。额勒和布，字子谦，号筱珊，满洲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乌里雅苏台将军。此日记为其在官时一切日常事务，关于蒙古台站官名所记特详。而老头会一案，为人民反抗封建势力之组织。《廷寄录存》荣全、袁保恒等奏折，可知当时左宗棠用兵新疆军需调转之情形。

四、《日记》版本

《日记》第八、九、十、十一册，各册记事时间分别为：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一日起至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十二年闰六月初一日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十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至光绪元年七月十四日，各册末页板框外分别写有该册日记抄录时间：

光绪元年七月，录于乌里雅苏台军署云山环翠室。

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二日，补钞讫。

光绪二年正月十三日，录于乌城军署。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日，录于乌城军署云山环翠室。

这至少说明《日记》第八、九、十、十一册内容，曾经额勒和布誊抄，其抄写地点就是额氏当时的任职地乌里雅苏台。此四册与其余十三册，字迹一致，均为馆阁小楷，且无勾抹涂改痕迹。又，《日记》第三册首页铃印两枚，均为“额勒和布字子谦号筱珊行贰镶蓝旗满洲觉尔察氏”白文方形，印色一浅一深；第十四册中间页铃印两枚：“额勒和布”朱文方形、“筱珊”朱文方形。可证《日记》确为额氏旧物，而非

他人抄写。故《日记》可定为“誊清稿本”。

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曾以“奉使土默特贝勒旗会审老头会日记”之名,将《日记》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丛书之一种,影印出版。影印本字迹模糊不清,读者利用不便,故有此次《日记》之整理。

五、《日记》命名

日记的开始,缘于额勒和布的一次奉使。奉使结束后,额氏将写日记的习惯坚持下来。写作时未必想着就要以此留名,毕竟日记是很私密的个人记录。所以,额氏从来没有为整部日记命名。仅在第一册封面题“奉使土默特贝勒旗会审老头会日记”,第十七册封面题“廷寄录存”,余十五册封面均题“日记”。

《日记》入藏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后,工作人员初以“额筱珊日记”称此日记。不知何时起,又以第一册封面所题“奉使土默特贝勒旗会审老头会日记”之名著录此书。四川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日记》时,亦沿袭此名。但此名仅能反映第一册日记内容,不能反映整部日记全貌,故冠于整部日记不甚合宜。

此次整理日记,以“额勒和布日记”为整部日记命名,而其分册仍冠以原名。即日记的奉使部分仍名“奉使土默特贝勒旗会审老头会日记”,第十七册仍名“廷寄录存”,余则名之“日记”。如此,既可反映日记之全貌,又不失名随主人之意。

六、《日记》价值

《日记》对研究晚清官僚饮食文化、官僚交际与人物关系,以及乌里雅苏台地区政治与文化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官僚饮食文化

额勒和布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其饮食活动。

如京城饮食。同治四年(1865)九月,额勒和布由理藩院侍郎调